

# 臺灣民粹主義者與反菁英情緒： 世界價值觀調查臺灣資料的分析

蔡明璋、潘欣欣

作者感謝臺灣社會學刊編輯委員會以及匿名審查人的審查意見，以及陳志柔教授、吳文欽教授在問卷設計及調查過程中所提供的協助。本文一切文責由作者自負。

※收稿日期：2021.02.02 接受刊登：2021.06.17

蔡明璋(第一作者✉)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通訊地址：115201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128號  
Email：mtsai304@gate.sinica.edu.tw

潘欣欣(通訊作者✉)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通訊地址：111002臺北市士林區臨溪路70號  
Email：phsinhsin@gmail.com/ hhp@scu.edu.tw

## 摘 要

在臺灣的脈絡下，本文以人民決策、反菁英、庶民誠意，以及強人領導等四種反菁英情緒指標建構民粹主義概念。本文以潛類型分析2019年世界價值觀調查臺灣資料，將臺灣民眾分為低度、中度與高度等三種潛在民粹類型。結果顯示約有1/3的民眾屬於低度民粹，相信政治菁英仍會在意他們的意見。另外有54%屬於中度民粹民眾，感覺自己的政策發聲，不受政治菁英的重視。最後約有1/8的民眾屬於高度民粹，反菁英情緒最為激進。同時，高度民粹與中度民粹民眾總和有2/3，意謂大多數民眾對政治菁英產生反感。其次，本文運用迴歸模型，對這三種類型民眾的人口社經背景進行分析，結果發現：高度民粹民眾與個人主觀感受的經濟不安全感及國民黨支持度有正面相關。最後，研究發現，高度民粹民眾懷有菁英與政府都是貪腐的想法、高度政治不信任感，甚至強烈排斥移民及同性戀團體。民粹主義不僅在政治上產生效應，也會將保守價值擴散蔓延到社會議題。

**關鍵詞：**民粹主義、潛類別分析、政治信任、社會偏見

# Populism and Anti-Elite Sentiments in Taiwan: An Analysis of the World Values Survey Data

**Ming-Chang Tsai**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a Sinica

**Hsin-Hsin Pa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oochow University

We conceptualize populism in Taiwan as endorsing anti-elite sentiments, which comprise popular sovereignty, anti-elitism, sincere people, and strong leadership. Based on the 2019 Taiwan dataset of the World Values Survey, we use the latent class analysis to differentiate respondents into three groups: the weak, mild, and strong populists. We find that approximately one-third of Taiwanese is weak populists who expect more power elites' attention; 54% is mild populists, who voice their policy concerns but feel disregarded by power elites; and one-eighth is the strong populists with the highest score on all four dimensions of anti-elite sentiments. Because both the mild and strong populists sum up to two-thirds of the adult population, a large majority seems to hold an anti-elite sentiment. The outcomes from our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social-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backgrounds of the populists suggest that strong populism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perceived economic insecurity and support for the KMT party. Moreover, populists tend to believe that elites and the government are corrupt, register a low level of political trust, and discriminate against homosexuals, people with HIV, and immigrants. In summary, populists in Taiwan not only denigrate elites but also are conservative in value positions.

**Keywords:** populism, latent class analysis, political trust, social prejudice

## 一、導論

在邁向民主化的過程中，民主制度鞏固、理性治理深化的同時，民粹主義領袖在這些民主國家中召喚了大量的支持民眾，對抗政治菁英與建制。民粹主義政權如何一次又一次贏得全國大選，成為全球學界高度關注的研究議題（de la Torre and Peruzzotti 2018; Kaltwasser et al. 2017）。臺灣學界就地取材，也累積了一些民粹主義相關的研究，試圖理解近年來在全球民粹主義風潮下，臺灣的民粹主義衍生的過程，並提供經驗證據，分析民粹支持者的背景特徵和潛在的政策傾向。臺灣學者對民粹主義研究，主要以李登輝與陳水扁兩位民選總統，做為民粹領導的案例（黃昱珽、蔡瑞明 2015；黃昱珽 2014；王振寰、錢永祥 1995）。呈現民選總統在競選策略中，以訴諸人民的心聲做為號召，激發選民對抗舊體制與舊利益，做為民粹主義的觀察指標。這個類型的研究，以少數個案呈現菁英由上而下召喚民眾的現象，建構臺灣民粹主義的概念，難免侷限於一隅，未能關照到群眾的民粹主義反應。

另一方面，已有學者利用全國性民意調查資料，據以理解臺灣民眾所表現的民粹傾向，分析民粹主義的行為模式及其社會性的起源。這個研究方向符合新一波全球學界對於民粹主義研究的學術旨趣，深入瞭解民眾的民粹意向、意識型態或世界觀，理解他們如何看待自己與政治的關係。這個取向專注於民粹領導的興衰演化，或由上而下的政治動員實是相輔相成。從這個角度來看，張佑宗（2009）的研究有著先行者的啟發性。該研究從 2006 年亞洲民主動態調查計畫（Asian Barometer Surveys）臺灣子計畫的資料當中，選取六個測量指標，分別代表垂直課責與水平課責兩個面向，藉此區分出四種不同類型的政治傾向。唯課責的概念主要測量人民對於民主治理制度的態度，而未涵蓋民粹主義其

他重要的政治價值態度，例如權力菁英與人民的對立關係。由於這套資料並未以民粹主義概念進行題組設計，因此所呈現的主要結果難免有所缺憾。這項研究發現：僅有教育變項對於民粹主義態度具有顯著的負向效應，其他重要的社會政治經濟因素，則未產生重要的作用。

在另一份最新的研究中，林文正與林宗弘（2019）就支持韓粉與柯粉的群眾，檢視他們的族群背景、身分認同和階級地位。這份最新的研究利用中研院社會所蒐集的「臺灣社會意向調查」資料，其設計上有明顯的缺憾。該研究首先認定泛藍或柯文哲支持者具有民粹主義的傾向，但柯粉在本質上是否等同民粹主義支持者，還需更多理論支持。從分析的結果來看，身分認同為臺灣人者較支持柯文哲，而泛藍傾向則較不支持。由於該文在 2018 年 6 月與 12 月執行調查研究，此時民進黨尚未與柯文哲決裂，柯做為民進黨替身，臺灣人認同與柯文哲的支持因而呈現正相關，這並不令人意外。林文正與林宗弘（2019）的研究主要在探究藍綠政治支持，而非直接解析民粹傾向。值此臺灣民粹主義風潮興起之時，學界需要新的實證資料與研究架構，重新檢證臺灣民粹主義。

上述的經驗研究討論，指出國內文獻仍有幾個不足之處。第一，直接測量與觀察民粹傾向的方法尚有諸多不足之處。本文參照國際學界新近民粹主義的研究，並以過去臺灣相關研究為基礎，試圖提出新的概念與測量指標。第二，過去研究對於釐清民粹主義對當代臺灣社會的潛在影響，除了需要系統性地檢證跨國一般性理論，特別是階級位置與經濟資源剝奪感等因素，對臺灣民粹主義傾向的影響之外，也需要將臺灣在地情境，例如族群政治，納入研究框架。第三，許多研究認為：民粹主義者並非是意識型態完整、鮮明的團體，而是一個缺乏中心思想、意識型態薄弱的街頭群眾，他們像是流水一般，無體無形，鮮能展現出獨特

的政策態度 (Stanley 2008)。這個假設也值得仔細檢驗。本文就這三個層面上所觀察到的限制，提出合理修正，也提供新的經驗證據來說明臺灣民眾的民粹主義傾向現況。

## 二、民粹主義的概念化與測量

民粹主義的核心元素，是相信人民權力受到建制菁英的阻隔，因而發生的反動勢力的集結 (Stanley 2008; Mudde 2004)。這個簡明版的定義僅呈現民粹主義最核心的特徵，完整的說法需要如下的延伸。首先，民粹主義者的基本信念是，既有的治理體制為政治菁英控制，沒有能夠有效的反映、代表他們做為人民的真正想法。在他們與權力菁英中間缺乏溝通管道。Anselmi (2017) 指出，統治者與人民之間社會媒介 (social mediation) 機制太弱，因而民粹主義者覺得他們的聲音沒有被傾聽。他們要的不只是「主權在民」(popular sovereignty) 這樣的空洞抽象術語，而是要更直接的以庶民之名，引導政府的決策。

庶民決策這樣的想法，反映民粹主義者想像的權力結構關係。腐敗的權力菁英，以及他們所控制的政府體制、為這個體制服務的技術官僚和知識分子，都被看作是一丘之貉，不僅是與人民的想法和利益有很大的鴻溝，更正確的說法是：這些政治菁英，是站在民之所欲的對立面。民粹主義者相信權力菁英是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團體，把持國家機器，和人民的想法扞格不入。也因為權力菁英與人民真正利益的距離太過遙遠，即便菁英的職位是經由民主選舉程序取得，也已經失去正當性了，不能再代表人民的意志和想法。

民粹主義者相信，他們代表的是一般民眾或社群的真實想法，吐露出的是真實誠意的心聲，相對的是政府、菁英的虛情假

意，暗中算計自身的利益。即使這些真摯情意有機會訴諸於媒體、網路或其他溝通管道，也得不到應有的重視，換來的是專業官僚嗤之以鼻，斥之不夠理性、缺乏專業。民眾的真心建議，換來他們熱心支持過的政治菁英之絕情拒斥。

民粹主義認為：菁英提出的公共政策，是在專業官僚體系象牙塔的產物，沒有想到人民需求要放在最優先。政策設計沒有那麼難，用一般常識就可以做到 (Taggart 2000)。而改革也不能等，不能在既有的官僚法令規則上打轉以致延誤時機。政府需要的是一位有領導力的人，即刻實現庶民之所欲。

人民決策、反菁英、庶民誠意以及強力領導，構成民粹主義的理想型，適當的測量工具，應該要就這四個面向進行聯集式的測量。在這裡，聯集測量的說法，是有特別意義的。首先，民粹主義是一個信念傾向，一般「民眾」或多或少都有這樣的想法。因此，民粹主義在測量時，應注意的是不同程度的差別，或是因此而顯現的特別類型。將民粹與其他「對立」的政治傾向（例如對民主治理的偏好）放在一起對照則應避免，否則有礙測量的單純化。<sup>1</sup> 第二，目前民粹主義經驗研究，大致上是以變項取向的分析方式進行 (Akkerman et al. 2014; Rooduijn and Pauwels 2011; Schulz et al. 2018; 張佑宗 2009)，分析重點在於以民粹主義態度在連續性的光譜上呈現的高低程度，但是未能觀察組成民粹主義者的不同類別表現與彼此之間的差別，因此對民粹主義類型的分析形成重大限制。本文四個元素的關係是累加式的聯集，而不是重疊式的交集。理論上這四個元素中的任二個組合、三個或四個組合都可能出現。用集合的概念來說，{1, 2}、{1, 3} 與 {1, 2, 3}、{1, 2, 3, 4} 均為可能。但這四個元素不一定會全數

1 民粹主義者並非不支持一般的民主制度，他們可能比其他人更在意政府決策是否依照他們的意思制定，即使他們並不積極地涉入政治 (Mudde 2004)。

出現，亦即可以允許 {4} 與 {1, 2, 3} 的相關較低的情況。<sup>2</sup> 若將這些元素（視為變項）放入因素分析模型，可能會因為 {4} 的低相關而放棄這個重要原因。因為這些元素共同描繪民粹主義的特徵，在分析的策略上，注重這些元素聯合樣式的統計模型，會是較為合適的。

### 三、民粹主義的解釋因素

在臺灣的脈絡下，究竟是什麼樣背景的人會支持民粹主義呢？現有的理論指出二個假設，值得我們在臺灣的脈絡下加以檢證。首先，社會經濟地位的變化會影響個人是否支持民粹主義：社經地位面臨邊緣化的人傾向支持民粹主義；反之，社經地位上升則是較不易支持民粹主義。其次，族群政治的表現也會影響民粹主義的接受度。族群關係緊張的社會是民粹主義的溫床，而族群關係和諧的社會則不易滋生民粹主義。以下的章節，我們將分別回顧文獻如何探討這兩種民粹主義的源頭。

首先，文獻上在論及經濟地位邊緣化做為民粹主義源頭時，經濟地位邊緣化所指涉的不僅是客觀上就業或收入偏低的情境，而是一種主觀上認知的不公平或相對剝奪感。拉丁美洲歷史悠久的民粹政治，大多深植於強烈的階級剝奪感。阿根廷的裴隆主義（Peronism）是最經典的民粹主義範例。他將政敵，即地主與資本家組成的寡頭階級，描繪成「人民」的敵人。他當選之後，政府隨之以提高工資、凍結房租並拉攏工會回應群眾的支持。裴隆運用他個人的領導地位以及個人魅力，在政治上與都市中產階級徹底劃清界限，藉此鞏固集中個人政治權力，改變國家資源的分配政治（Taggart 2000）。de la Torre 與 Peruzzotti（2018）蒐集

2 如果要求高相關的指標，而在因素分析或信度係數上有較佳表現，這個方向的要求，在以區分較多分類的分析模型上，反而不是最有利的操作，因為傾向於只產生單一向度（最大因素上）的差別。

過去 20 年拉美政權更迭資料後發現：民粹政權崛起的契機，大多肇始於新自由主義政策後引發的政治危機。民眾熱烈支持能夠扭轉局勢而回歸左派政策的強人領袖。

其次，當代亞洲也產生了特有的民粹主義模式，泰國的塔克辛及其領導的泰愛泰黨則是當中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塔克辛在 2005 年競選連任時，決定轉向廣大的貧窮民眾，特別是以農民做為政治訴求對象，直接將「貧民聯合」(The Assembly of Poor) 這個組織的主張，拿來做為自己的選舉主要訴求。為了動員這個具有廣大群眾基礎的運動，塔克辛鼓吹「傳統淳樸」的農村，起身對抗現代敗德都市（特別是曼谷）的政治論述。他宣稱自己也是人民中的一員，與人民同一陣線，而他訴求的人民主要是農民，特別是泰國北部的農民，他們是泰愛泰黨的核心支持者 (Hellmann 2017)。

最後，歐美先進民主國家在這幾年，也接連掀起了民粹主義的浪潮。Cramer (2016) 以美國威州州長沃克 (Scott Walker) 為例，沃克以民粹領袖之姿勝出，並非全然是鄉村居民與麥迪遜市的經濟差距的緣故，而是長期累積的不公平感受所致。鄉村和小城鎮的農業工作者，自認為是不幸深陷貧困、一無所有 (have-nots) 的普通百姓，無人聞問。這種鄉村意識和憤恨情緒，也成為支持川普 (Donald Trump) 的重要情緒因素 (Cramer 2016)。<sup>3</sup> Hochschild (2018) 針對美國路易斯安那州南方的茶黨 (Tea Party) 支持者進行訪談研究後發現，這一群保守右派的白人中產和工人階級，對聯邦體系的運作深感不滿，認為福利資源竟然會以外來移民、少數族群及職業婦女為優先分配的對象，雖然他們老實納稅，但是他們的想法與權益卻沒有得到應得的尊重。支持

3 這種弱勢農村相對於強勢都市的背景下，所滋生的民怨，在臺灣社會並不盛行。臺灣的農村社區或城鎮利益結構相當複雜，有時以地方派系的方式展現，以便分配到大都市與國家掌握的公共資源，具有主動議價的能力。這與民粹主義產生的反菁英態度不完全一致。

川普的許多群眾，多少有一種「身分地位不穩」(vulnerabilities of status) 的感覺。保守右派的支持者認為終於有像川普這樣強力的領導人來為他們撥亂反正。

綜合上述討論，民粹主義有諸多的表現形式，並不全然是沿著階級切割而成的政治團體。民粹主義所反對的權力菁英，亦是都有非常複雜的出身或政治主張，也很難說在階級地位上有很清楚的特徵。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假設是大眾社會 (mass society) 理論，它描述的社會邊緣群體，相對於那些階級成員身分明確的群體而言，是最有可能支持民粹主義 (Roxborough 1980)。但這個說法過於低估民粹主義成員在特定情境下的動員能量。較為合理的假設是：民粹主義者是那些主觀感受到被主流社會與政治菁英排斥的個人。剝奪感以及身分的失落激起民粹的憤怒情緒，是美國、拉丁美洲或亞洲民粹主義最大公約數。

就一般觀察而言，臺灣的政治經濟發展情勢的確具有孕育民粹主義的要件。近二十年來臺灣整體經濟發展逐步趨緩，一方面勞工低薪、工時長及工作環境惡劣的問題叢生；另一方面，大家族企業逐步發展成交叉持股通婚的寡頭集團，把持國家資源 (李宗榮、林宗弘 2017)。同時階級流動也開始停滯，不僅在個人層次上，黑手變頭家的階級翻身機會微乎其微 (李宗榮、林宗弘 2017)；在代間階級向上流動的機會亦是希望渺茫，個人努力所能造成的改變有限，無力翻轉對抗世襲而來的資源劣勢 (Chu and Lin 2016)。值此同時，臺灣已在政治上歷經兩次政黨輪替，但國家在經濟發展與資源分配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卻逐步消退 (李宗榮、林宗弘 2017)。許多臺灣民眾對現狀下的臺灣經濟發展多有不滿。他們當中有許多人將臺灣經濟發展減緩的原因，歸諸於民主政體下菁英的無能與無效率，從而對臺灣過去威權體制下主導經濟起飛、社會結構穩定、人權自由相對被壓制的執政菁英深具懷舊之情。另外，這些民眾也可能將中國經濟高速成長歸因

於中國威權體制菁英的作為，因此更加強化他們對民主體制下執政菁英的怨懟。

另一個問題是，就臺灣的脈絡而言，族群政治有可能是民粹主義的潛在因素嗎？我們認為民眾對於不同省籍的總統可能有較強的疑慮，相信總統以及身邊的官僚或所屬政黨站在人民的對立面。從國民黨的支持者傾向支持韓流的現象（林文正、林宗弘 2019）來看，政黨偏好也可能是一個潛在的推力。國民黨失去政權後，韓國瑜選擇民粹主義的路線，以庶民的修辭與訴求重新包裝選戰策略，將人民與民進黨權力菁英樹立在衝突對立面，這意謂著部分國民黨支持者轉向擁抱民粹主義式的政治論述。族群政治的相關因素及其潛在的影響，也應該加以評估。

#### 四、民粹主義的潛剖面分析

本文採用潛剖面分析，這是結構方程式的一種次類型，這兩種分析模型都是資料取向（data-driven）而來。潛剖面分析是假設潛在類別之間是局部獨立的，以最大概似法估計可能的類別數目，以各種適合度的統計值來建議較佳的分類數。以民粹主義四種要素為基礎，假設樣本內的民粹主義者型態在四種要素不同的組合下，將樣本中的次人口群體進行分類。如前所述，這個基本的出發點與變項取向不同，變項取向的分析，傾向將這些異質型態以關係模式處理，同時假定所有觀察單位的相關是連動的，這種同時相關的假設，在型態分析方法上並非是必要的。這個較為開放的假定，也符合本文先前討論的聯集觀點：意即變項的組成模式，而非變項的相關程度所切割出來的不同面貌之民粹主義群體，是本文最感興趣的。

本文的分析資料來自世界價值觀第七波的臺灣調查，<sup>4</sup> 由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執行，於 2019 年 3 月至 6 月期間進行全國性的隨機抽樣，在 48 個被抽中的鄉鎮中，分別有兩個里進行面訪，每里受訪人數在 11-18 人之間，最後訪問了 1,223 位成年人。面訪員系統採用平板電腦，同步內建戶中抽樣功能，以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等條件篩選戶中合格受訪者。這個調查資料提供了四個層面共八個民粹主義的相關題目，這些題目的設計是在 4 點量表上就下列的問題表示意見。<sup>5</sup> 原始問題與測量尺度請見附錄 1。

### (一) 人民決策：

- 人民決策：應該是人民，不是政府官員，來決定最重要的政策 ( $p_1$ )

### (二) 反菁英情緒：

- 沒影響：我們一般民眾對政府的作為，沒有任何影響力 ( $p_2$ )
- 不理會：政府官員上任後，很快就不理會一般民眾的感受 ( $p_3$ )
- 不在乎：大多數政治人物不會在乎我們一般民眾的想法 ( $p_4$ )
- 不允許：臺灣的政治體制，不會允許您這樣的人，對政府所做的表示意見 ( $p_5$ )

4 世界價值觀調查的臺灣資料尚未公開，本文得到資料蒐集者同意使用。

5 反菁英題組的最後一題（不允許）為 5 點量表（絕不會 = 5，一定會 = 1）。調整為 4 點量表後，潛剖面分析亦產生相同的結果。

### (三) 庶民誠意：

- 善意：為公共事務挺身而出的民眾常常是出於善意的，但官員往往不支持 ( $p_6$ )
- 被糟蹋：一般民眾常被有錢有勢的政治人物糟蹋 ( $p_7$ )

### (四) 強力領導：

- 強領導：一個不會受到立法院與選舉干擾，且強而有力的領導者<sup>6</sup> ( $p_8$ )

本文順著國際的民粹主義測量方向 (Akkerman et al. 2014; Schulz et al. 2018)，同時考慮臺灣的本土脈絡，製作以上包含人民決策、反菁英、庶民誠意與強力領導等四個面向，共八個問題的民調題組，測量受訪人民粹主義態度的特徵與強度。因為歐洲晚近掀起了右派民粹主義浪潮，並帶動全球民粹主義研究趨勢，因此民粹主義的相關民調研究，以歐洲國家的案例討論最多。本文也受到這一系列民調研究的啟發，並根據臺灣政治經濟社會情勢，修訂、剔除或新增現有文獻中的民調題組設計。

舉例而言，Akkerman 等人 (2014) 以荷蘭為案例，另外 Schulz 等人 (2018) 則是以瑞士為例，測量受訪人的民粹主義傾向。我們在人民決策與反菁英傾向的部分，參考採納了他們共有的題組，測量受訪人如何看待人民與權力菁英的權力位階與衝突對立關係。另外，在 Schulz 等人 (2018) 所設計的庶民誠意題組，我們進行增訂。

---

6 這個題目的前導陳述是：下面我們將列舉幾種不同的政治體制，如果在臺灣用這些政治體制，請問您認為是很好、好、壞、還是很壞？

本文使用潛剖面分析來進行民粹主義群組的觀察 (Nylund-Gibson and Choi 2018; Oberski 2016)。潛剖面模型 (latent profile model) 是將一組可觀察的連續變數，運用其變異量來解釋並估計一組互斥的潛在類別 (latent class) 之間的關聯，模型假設潛在群體之間具有獨立性，每種類別對各個可觀察的類別變數都有特定的傾向。基本模型是利用最大類似法估計如下的各別分類的模型：

第一分類的估計式是：

$$p_1 = \alpha_{11} + e_{1p1}$$

$$p_2 = \alpha_{21} + e_{2p2}$$

...

$$p_n = \alpha_{n1} + e_{npn}$$

第二分類的估計式是：

$$p_1 = \alpha_{12} + e_{2p1}$$

$$p_2 = \alpha_{22} + e_{2p2}$$

...

$$p_n = \alpha_{n2} + e_{npn}$$

第三組或更多組的估計可以同樣方式設定。民粹主義的指標受到數個潛在因素 ( $k$ ) 影響。以上的模型設定僅有常數項，亦即是各個指標的平均估計值 ( $\alpha$ )，以及殘差項 ( $e$ )。依上述的估計結果，再以多元類別邏輯迴歸去估計每個觀察單位在各類別上的機率，取其最高的機率做為歸屬某一類別的依據。

在估計進行的過程中，不同數目的潛剖面模式的適合度列出如表 1。從 log likelihood 的比較（分析模型與 null 模型），或 AIC 或 BIC 的數值來看，在三分類的模型時，這三個適合度統計指標的下降幅度均是最大，顯示選取三類組的模型是適合的，更細、更繁複的分類，例如五個剖面的模式，反而適合度不是最佳的。表 1 也列出另一個適合度的粗略指標，即 Entropy 數值。這個數值計算自每一個受訪者落入某一個剖面的機率，其數值的範圍是 0 到 1 之間。在最高值（1）表示受訪者可以分類到某一剖面而不屬於其他剖面（Clark and Muthén 2009）。雖然這個指標在大於 0.8 時表示分類結果可以接受，但是三個分類，相較而言，是最為理想的。

表 1：潛剖面模型的適合度

K	Log-Likelihood	AIC	BIC	ABIC	Entropy
1個類型	-10987.035	22006.071	22087.815	22036.993	
2個類型	-10410.478	20870.956	20998.682	20919.272	0.755
3個類型	-9190.781	18449.561	18623.269	18515.271	1.000
4個類型	-9162.158	18410.316	18630.006	18493.420	0.947
5個類型	-9172.150	18448.301	18713.972	18548.798	0.950

ABIC= sample-size adjusted BIC

圖 1 展示潛剖面分析的三類組在指標的平均數，可以視為是所有受訪者在縱切面的分層界線。最上面一條線的這個類別，各指標（從  $p_1$  至  $p_8$ ）均很明顯表現高的分數，特別是「不在乎」這個指標。這個群體可以稱之為「高度民粹民眾」。第二條線的分群，在「不允許」這個指標上與激進民粹主義頗為接近（5 點量表），顯示他們主觀上認為意見受到壓制無法發聲。這個群體可稱之為「中度民粹民眾」。最後的一類的特徵是認為政治人物並沒有不在乎他們的想法（ $p_4$  均數明顯較低），或許覺得仍能期

待他們的聲音被政府或政治菁英聽到、注意到。這群人可稱之「低度民粹民眾」。這三群組分類構成的型態相對而言並不複雜。本文測量民粹主義的指標僅有八項，因而也不適合過度繁複的分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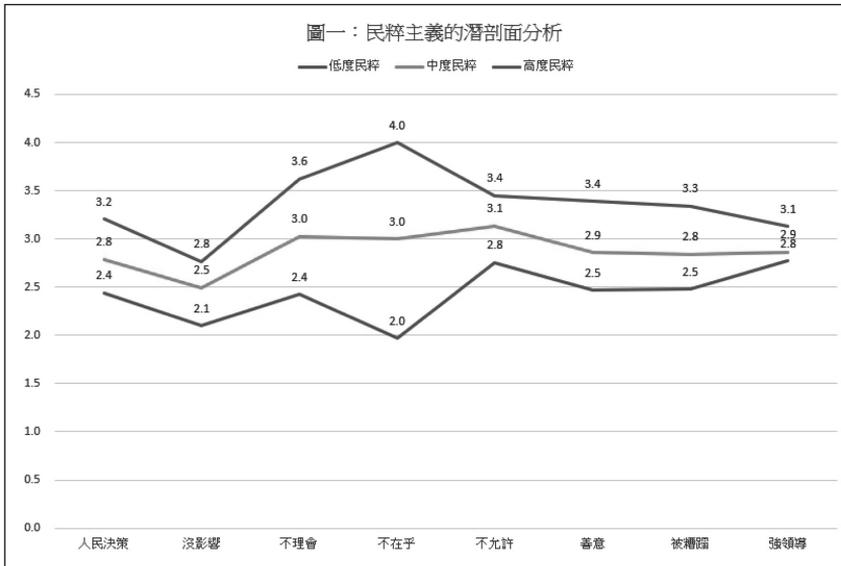


圖 1：民粹主義的潛剖面分析

表 2 的第一列，列出這三類民粹主義不同類型的比例。<sup>7</sup> 高度民粹民眾有 12.6%，從這裡推估，臺灣社會的成年人口中，近 1/8 有強烈的民粹主義傾向。第二類「中度民粹民眾」約有 54%，這個群體人數頗多，也顯示超過一半的民眾感覺自己的政策發聲受到壓抑。最後一類為低度民粹民眾，約占 1/3 的比例，民粹主義的傾向較不是那麼濃烈，相信政治菁英仍會在意他們的意見。高度民粹民眾與中度民粹民眾兩者合占成年民眾的多數，

7 本文並未假設所有臺灣民眾都是民粹主義者，儘管「低度民粹」與其他類別民粹主義者具有某些相同的反菁英情緒，但這個型的民眾的民粹傾向明顯較低，他們的反菁英情緒相對較弱，可以做為不同團體比較的對照組來進行分析。

意謂著民眾對政治菁英仍有相當明顯的對立感覺。這個現象其實並非臺灣所獨有，其他政治民主化已經成熟、社會不平等相對輕微的地區裡，民粹主義亦未消失（Herman and Muldoon 2018; Pappas 2019）。

最後，我們檢驗民粹主義測量題目內在效度，並從構念效度（construct validity）來觀察，亦即它與理論上應該產生緊密相關的行為或信念應高度相關。晚近有一系列的文獻由社會學、政治學及經濟學等三個社會科學領域學者所共同參與建構，探討民粹主義者對於社會的階層差異感受特別尖銳，從而滋生反菁英情緒，並在民主體制中強力訴求支持財富重分配等社會政策改革（Marx 2020; Sawyer and Laycock 2009; Marx and Nguyen 2018; Cardoso and Helwege 2017; Campos and Casas 2020）。因此我們選擇三個這樣的指標來檢證：受訪者認為民主政治是否要有這些基本特徵：國家對於民眾經濟生活的責任。我們詢問受訪人民主國家的基本特質是否必要包括「政府向富人課稅並補助窮人」、「失業的人受到政府的補助」以及「政府使民眾的收入平等」。10分表示一定必要，1分表示不是必要。這三個指標的加總與民粹主義者類別進行變異數分析，發現高度民粹民眾與其他類型民眾兩兩相較，的確都有顯著的不同，顯示高度民粹民眾更強烈地認同國家應當重視重分配政策，這項關係可以支持本文的民粹主義類型有其效度。

## 五、誰是民粹主義者？

民粹主義是沿著社會階級界線，不論是客觀或是主觀的階級指標所劃分而來的激進政治團體嗎？如果不是的話，是族群政治因素所導致的政治傾向嗎？為了回答兩個主要問題，本文將不同

人口屬性的受訪者與三個分類做了交叉分析，並進行  $\chi^2$  檢定，結果列於表 2。結果顯示性別的相關性並不高，而年齡組中，30-39 歲這個群體有較多的比例（16.3%），是劃分在高度民粹民眾這個組別中。這群較年輕的成年人，正值成家立業的階段，在面對權力菁英時，感受到更大的權力差距。

教育、就業地位與個人收入則是最常用的客觀階級地位指標。不同教育程度者，民粹主義的型態並不相同，高中職的教育程度者中，相較於碩士以上學歷或國中以下，有較高的比例屬於高度民粹民眾（15.1% 比 7.9% 與 11.0%），這樣的差距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在就業地位上，特別應注意的是失業或是兼職工作者，以及自雇者，這兩類人在勞力市場所經驗的不穩定或不安全，促使他們向激進的民粹主義群靠攏（約 16.0%）。相對地，退休的群體中，僅有 10.8% 的比例屬於激進民粹者。退休及年改相關政策或許對公職人員有一定影響，但是退休者是一個相當高異質性的人口，整體來說，屬於高度民粹民眾這個類別的比例不是很高。收入的高低，與民粹主義的型態無關。<sup>8</sup> 最低收入組（月收入三萬以下），有 14.6% 的激進民粹人口，但與其他收入組別的差距，仍在誤差的範圍內。這些分析結果顯示，物質條件因素表現的社會經濟地位差異，與民粹主義並非全然無關。

---

8 這項分析只說明目前有所得的受訪者。

表 2：民粹主義的人口特徵 (%)

	高度民粹	中度民粹	低度民粹	$\chi^2$ (df)檢定
全部受訪者	12.6	53.9	33.5	n=1,223
性別				n=1,223
男	14.8	53.5	31.7	5.8(2)
女	10.5	54.2	35.3	
年齡				n=1,222
18-29	11.7	55.1	33.2	29.0(8)**
30-39	16.3	59.7	24.0	
40-49	13.1	58.2	28.7	
50-59	13.1	55.7	31.2	
60+	10.4	45.8	43.8	
教育程度				
國中以下	11.0	46.3	42.8	19.8(6)**
高中職	15.1	55.8	29.1	
大專	12.6	57.0	30.4	
碩士以上	7.9	51.8	40.4	
就業狀態				n=1,179
全職受雇	12.8	58.0	29.2	21.5(8)**
自己開業	15.9	53.1	31.1	
失業+兼職	16.0	54.4	29.6	
家庭主婦	9.5	52.5	38.0	
退休	10.8	44.3	44.9	
個人月收入				n=958
3萬以下	14.6	52.7	32.7	2.6(6)
3-5萬	12.8	56.1	31.1	
5-8萬	13.4	50.7	35.9	
8萬以上	11.4	53.5	35.1	

續上頁表 2

家庭經濟狀況				n=1,223
好	11.7	52.6	35.8	9.4(2)**
不好	15.5	57.9	26.6	
家庭收支狀況				n=1,210
有存到錢	10.6	53.4	36.0	23.5(4)***
收支平衡	10.0	52.3	37.6	
花掉積蓄，可能還要借	18.6	56.0	25.5	
階級認同				n=1,209
中上階級	11.2	51.0	37.8	4.8(4)
中下階級	11.5	54.7	33.8	
勞工階級	14.0	54.7	31.2	
父親族群身分				n=1,199
閩南人	11.6	53.8	34.6	8.5(6)
客家人	15.9	57.6	26.5	
原住民	11.1	50.0	38.9	
外省人	19.5	51.2	29.3	
政黨認同				n=1,223
民進黨	7.0	44.0	49.0	45.0(10)***
國民黨	17.1	52.4	30.6	
泛藍	9.9	64.8	25.4	
泛綠	10.5	51.2	38.4	
無黨籍	12.6	58.3	29.1	
其他	13.2	59.0	27.8	

續上頁表 2

生活水準與努力				n=1,215
很公平	16.8	41.6	41.6	32.4(4)***
公平	10.6	53.5	35.9	
不公平	16.8	62.3	20.9	
地區				n=1,223
北部	13.8	53.9	32.3	2.1(4)
中部	10.6	53.0	36.4	
南部與東部	12.1	54.2	33.7	

註：地區分類如下，

北：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新竹市、新竹縣、宜蘭縣

中：苗栗縣、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

南：嘉義市、嘉義縣、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澎湖縣

東：花蓮縣、臺東縣

接著再分析三個主觀的社會經濟位置（測量方法請看附錄 2）。首先，受訪者自行認定家庭經濟兩狀況，認為屬於「不好」的受訪者中，有 15.5% 屬於高度民粹民眾，而有 58% 屬於中度民粹民眾，與認為經濟狀況「好」的受訪者呈現很明顯的差異。第二個變項是家庭收支的足夠程度，它亦呈現顯著的影響，認為入不敷出的群體中（「花掉積蓄，可能還要借」），有 18.6% 屬高度民粹民眾。相對地，表示「有存到錢」與「收支平衡」兩類人中，他們的民粹傾向稍低於臺灣社會的一般情況（約低 2-2.6%）。最後一個主觀位置是自我認定的階級身分。交叉分析的結果是，自認為屬勞工階級者，屬高度民粹民眾的比例稍高（14.0%），但卡方值較低，這個階段身分認同的影響並不明顯。

接下來，民粹主義的不同型態是否受到臺灣族群政治的影響

呢？首先，過去族群研究主要以父親族群身為依據，將臺灣區分為四大族群，分析結果顯示和民粹主義並無相關。父親族群身為外省人身分者雖然有 19.5% 歸屬在高度民粹民眾這一類，但客家人亦有近 16.0% 的比例，閩南人與原住民稍低，但統計上來說，這些差距並不明顯。相對地，政黨偏好與民粹主義的關係則相當密切。在六項政黨認同的分類中，國民黨認同者有最高的激進民粹主義者，約近 17.1%；相對地，最低的是民進黨認同者，僅有 7.0%，相差了 10%。其他較模糊的政黨認同身分者（如泛綠、無黨籍等），比較接近整個樣本的分配比例。簡言之，國民黨的堅定支持者（所謂深藍群眾），而非是外省族群，傾向於表現激進的民粹主義。

最後表 2 最後也列出另二個一般認為可能相關的因素。首先是不公平感知，認為目前的生活水準與自己的努力有所差距而感到「不公平」者，有較高的比例屬高度民粹民眾這一類；但回答「很公平」者，亦有相似的比例。不過，前者有很高的比例（62.3%）歸屬在「中度民粹民眾」群中。整個來說，公平感與民粹主義仍有微弱的相關。最後，將所有受訪者依受訪所在區域分為北、中、南（與東部）等三個大區，並未發現不同的民粹主義型態。激進民粹主義並不是地域性的特殊表現。

## 六、民粹主義者的意識型態和社會容忍

民粹主義的主要研究學者認為，民粹其實是極為模糊的語詞、很難以掌握的概念，或是一種中心思想很薄弱的意識型態（thin-centered ideology）（Mudde 2004: 544; Canovan 1999; Taggart 2000）。相較於強烈意識型態，例如自由主義、社會主義或保守主義等，民粹主義是否能夠指導或影響個人的政治價值或

政策偏好，目前學界尚無共識。學者在分析民粹主義的影響時，主要採取兩個立場。第一個立場是民粹主義的影響有限，只限於與它的核心特質相關的反菁英情緒，這是較接近薄意識型態的假設（Stanley 2008）。另一個立場是民粹主義是帶有高度憤怒、怨懟、剝奪感的政治情緒，它長期醞釀，堆積成一座高牆，劃分出界線分明的政治立場（Hochschild 2016），而成為一個「完全的意識型態」（a complete ideology）。它的影響不僅延伸到對政治建制和民主制度的敵意，同時也擴及到自身與其他群體之間的政治利益衝突，從而表現出保守或偏執的政策傾向。

為了檢測這兩種不同立場的論點，本文選用三類指標做為依變項，分析在控制重要的人格特徵的情況下，民粹主義是否具有顯著的預測力。這三種指標分別是政府貪腐、政治制度的信任以及對污名化人口的容忍度（測量方法請看附錄 2）。弱意識型態論點的假設應是民粹主義與前一、二項指標有關；而完全意識型態的假設則是，民粹主義者應該也呈現一種保守傾向，對於同性戀、愛滋病患和移民，會認為不屬所謂的主流社會成員，而存有偏見或排斥的態度（Hochschild 2018）。

表 3 列出民粹主義者對政府貪腐的想法。第一欄估計的是評估臺灣社會的貪腐程度（從「很多」到「無」的 10 點量表）。第二至第五欄，則依序是政府機構、公共服務提供者，以及企業執行長的估計結果。高度民粹民眾這個群體，明確的表示貪腐在這些面向上均存在。中度民粹民眾也在政府貪腐這個問題上有較高的分數（即給出負評），則對地方機關亦有相似的質疑。這些迴歸估計均控制必要的人口、社經地位與區域等背景變項（請看表 3 的註）。

表 3：貪腐知覺情況度的迴歸分析

涉入貪腐的程度	貪腐 看法	中央 機關	企業 執行長	地方 機關	公共服務 提供者
民粹類型（參考組：低度民粹）					
高度民粹	1.53*** (.20)	.55*** (.07)	.40*** (.07)	.53*** (.07)	.50*** (.07)
中度民粹	.67*** (.14)	.09 (.05)	.05 (.05)	.12* (.05)	.06 (.05)
常數	7.33*** (.39)	2.36*** (.14)	2.38*** (.13)	2.34*** (.14)	2.27*** (.13)
N	1,128	1,080	1,069	1,086	1,088
R-squared	.131	.128	.095	.094	.095
Adjusted R-squared	.103	.099	.064	.064	.065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註：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就業狀況、個人月收入、家庭經濟狀況、家庭收支狀況、階級認同、父親族群身分、政黨認同、生活水準與努力、地區等因素已控制。

對政府與選舉制度的信任度的分析結果列於表 4。不論是對中央政府、政黨、國會或公家機構，高度與中度民粹民眾，相對於低度民粹民眾呈現明顯的差別。高度民粹民眾對菁英的不信任尤為強烈。接著，表 5 再進行社會容忍的估計，這個面向的態度，與民粹主義最核心的反菁英信念並不相關，在這裡是做為測試民粹主義意識型態的假設。以不願意與同性戀、愛滋病患和移民等三個常被污名化的目標人口做為指標，結果發現愛滋病患在不同民粹主義型態的群組中，並沒有不同的看待。但是對於同性戀和移民，高度民粹民眾仍有明顯的偏見。這個拒斥傾向值得注意，在臺灣的脈絡下，民粹主義的意識型態，向外延伸到受社會

污名化的群體範疇上，民粹主義者不僅是反權力菁英，而且是負面地看待移民和同性戀者，表現了極為反動的保守思維。

表 4：政治信任度的迴歸分析

	中央政府	政黨	國會	公家機關	選舉
民粹類型（參考組：低度民粹）					
高度民粹	.64*** (.07)	.50*** (.07)	.60*** (.07)	.42*** (.07)	.54*** (.07)
中度民粹	.27*** (.05)	.20*** (.05)	.22*** (.05)	.09* (.05)	.22*** (.05)
常數	2.11*** (.14)	2.75*** (.13)	2.28*** (.14)	2.25*** (.13)	2.49*** (.14)
N	1,111	1,110	1,106	1,116	1,119
R-squared	.201	.189	.177	.097	.180
Adjusted R-squared	.175	.163	.150	.067	.154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註：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就業狀況、個人月收入、家庭經濟狀況、家庭收支狀況、階級認同、父親族群身分、政黨認同、生活水準與努力、地區等因素已控制。

整體來說，當我們同時對照表 2 與表 4 時發現，大專以上高教育程度及中高收入者大多屬於「中度民粹民眾」。他們比「低度民粹民眾」更加不信任中央政府、政黨、國會等政治機構，這點與「高度民粹民眾」相似；但他們似乎較可以容忍受污名人口。這個結果有可能是因為中度民粹民眾，其教育程度與社會經濟地位，比起另外兩個類型較高，一般來說是較能接受或同情受社會壓抑的人口（Cheng et al. 2016；陳志柔、吳家裕 2017）。

表 5：對受污名人口的態度

不願意跟誰作鄰居	同性戀	愛滋病患	移民／外籍移工
民粹類型（參考組：低度民粹）			
高度民粹	.60*	.14	.64**
	(.25)	(.24)	(.24)
中度民粹	.22	.14	-.12
	(.17)	(.16)	(.17)
常數	-2.37***	-.70	-1.51**
	(.54)	(.47)	(.50)
N	1,128	1,128	1,128
Pseudo R-squared	.252	.177	.050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註：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就業狀況、個人月收入、家庭經濟狀況、家庭收支狀況、階級認同、父親族群身分、政黨認同、生活水準與努力、地區等因素已控制。

## 七、結論

本文認為臺灣脈絡的特殊性在於，臺灣的民眾並非由左右意識型態論述所能區隔（Hsiao et al. 2017），臺灣民粹主義的基礎主要環繞在菁英與民眾關係的衝突與對立。因此本文直接訴諸反菁英這個軸線，指出民粹主義彰顯的四大特徵包括：人民決策、反菁英、庶民誠意與強力領導，分別進行測量與分類。研究結果發現：臺灣民粹主義傾向可以歸類成低度、中度與高度等三種民粹主義者類別，而將近 13% 的民眾屬於較極端的高度民粹主義者。

本文基於臺灣脈絡的特殊性，選定貪腐知覺、政治信任度與受污名人口等三種態度與政策面向進行測量。首先，貪腐知覺是臺灣民眾對於權貴菁英最常見的抱怨。在臺灣私費參選、菁英背景優越、法治寬嚴不一及貪腐程度較歐洲高的情境下，權力菁英在社會的確具有如此刻板印象。

另外，臺灣做為第三波民主化的新興民主國家，對於現有民主體制的低信任，使得臺灣受到民粹主義者政治信任度低落的衝擊，而新興民主國家理論上容易因此導致民主崩潰的後果（Svolik 2013）。

第三，臺灣在政教分離原則、移民政策嚴格以及外籍移工占總人口比例較低的條件下，臺灣高度民粹民眾卻同樣敵視同性戀及移民或外籍移民。

第四，雖然臺灣的高度民粹民眾大多具有青壯年、低教育程度與工作不穩定的人口學背景，臺灣民眾長期缺乏左右意識型態的個人階級意識與社經結構下，民粹主義者具有下層階級的屬性。這種具有階級背景，卻缺乏階級意識的民粹主義者，究竟會為臺灣社會政治發展帶來何種影響，值得未來研究深入探討。

第五，在民主化持續深化的臺灣社會，民粹主義是受到一時打壓，但未必自然消失。像其他高收入、高現代化國家所觀察的一樣，民粹主義潛伏在反政治菁英的氛圍裡，眼尖的政治領導人能夠體察到潛藏在這群民眾內心的憤恨與不滿，而將這股激情轉化為自己的政治資產，鼓吹民粹主義論述，並動員民粹主義支持者加入權力鬥爭，從中獲取政治利益。這樣的政治動員、激化與割裂過程，在拉丁美洲、非洲，經常是主流的社會動員劇本。晚近甚至在成熟的民主國家，也上演這樣的劇碼，而引發民主衰退的疑懼。臺灣搭上了這波全球民粹主義浪潮，在國內政治上，民

粹主義已有崛起之勢，並對臺灣民主體制造成衝擊。但在相關的社會科學研究上，學界還未迎頭趕上這波政治社會的重大變化。目前臺灣在民粹主義研究的文獻，大多著重少數強人領導者的政治過程分析，不但個案較少，難以有前瞻性啟示，也忽略了群眾做為民粹主義崛起過程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本文的貢獻則是以最近蒐集的經驗調查資料，解析民粹主義者的型態，瞭解臺灣群眾表現的民粹主義模式，並探究可能的相關因素和民粹意識型態的強度。

激進民粹主義在臺灣並不是特別的盛行。經驗資料的分析顯示，僅有約 1/8 的民眾可以歸類到高度民粹民眾這個類型。這個群體即便對臺灣民主構成威脅，但應不至於翻轉民主政權，而使臺灣成為另一個民粹主義的新經典案例。高度民粹民眾雖然仍是少數團體，他們的成因仍值得關注。客觀的經濟地位高低，不能完全說明這個群體與其他較溫和、較輕微的民粹主義者之間的差異。在臺灣，民粹主義不全是階級路線的政治喧嚷型式，它不應單純的以經濟決定論來解釋。民粹主義與個人主觀覺知的經濟邊緣化和不安全感有密切的關係，一種地位喪失的感覺，將不少人推向民粹主義較激進的那一端。國民黨的堅定支持者，表現極為明顯的民粹主義傾向。國民黨曾是威權政黨，在民主化後的政治競爭，於馬英九政府時期轉向親中的立場，這個政策軸線未能獲得臺灣社會的支持，在 2016 年失去政權後，選擇以「反菁英」、「反建制」的原型民粹主義來操作動員。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選用民粹主義的策略，以庶民的語言：「恁北生氣了」，批判主政的民進黨「貪污腐敗，忘記人民的期待」。<sup>9</sup> 深藍菁英選擇自我民粹化，與這個政黨的原本屬性及其核心人物多為政治菁英世族出身的原貌差距頗大，這其中經歷了很大的策略轉折。不過這

9 自由時報，2019/12/30，〈韓國瑜昨夜造勢再爆粗口，網友酸爆：符合客群需求〉，連結請見：<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3024344>，取用日期：2021 年 9 月 22 日。

個過程的分析，不是本文的主要研究關注點。但高度民粹民眾終究是少數，對臺灣政治制度的影響應屬有限。全球民粹主義浪潮，對臺灣的影響相當有限，在臺灣這個逐漸成熟民主化的社會中，仍有不少的阻擋機制，特別是市民社會的各種反制力量，包括政黨、志願性公民組織、知識分子、媒體等，在民粹主義失控之前試圖先踩住剎車。

民粹主義者的信念強度值得學界在未來的研究上多加關注。本研究發現，激進的民粹主義是一種和政治權貴做為人民敵人，所掌控的國家機器針鋒相對的意識型態。民粹主義者對受污名化的團體則亦有很強烈的偏見。這種深層的負面信念如何發生，本文尚未能提供一個合理解釋。未來的研究值得在這個現象上更進一步的分析。

最後，本文仍有數個研究上的限制需加說明。第一點，對於民粹主義的概念化，學界逐漸有了共識，但這僅是就最一般性的特徵和工具的設計而言。誠如 Taggart (2000: 7) 所言，在不同的歷史時空下，民粹主義的在地特徵或型態，並不完全一樣。臺灣的民粹主義特有的徵（症）狀，應該可以仔細地釐清，發展更合於在地「風土民情」的測量方式。

第二點，潛類型模型假設每一個人屬於某一特定的分類，或者說在同一分類中並沒有異質性。這個假設在一些情況下或許適合，實務上這個限制可以放鬆，亦即可以假設每個人一部分屬於任何分類。基於這種部分成員的概念，歸屬分類時是給予不同的機率，這個方向的估計模型，通稱為混合成員模型（mixed membership model）（Airoldi et al. 2014）。但因為每個人所屬的特定類型，在理論上，數目繁多，參數估計值增加很大，事先有理論性的設定分類的性質與機率樣態，比較有助於選擇較適合的模型。常用的混合成員模型如 grade of membership model，在分

類較多時傾向於高估類別的數目，在極端分配的情況，其表現也不如潛類型模型（Finch 2021）。因此本文並未選擇使用。在民粹主義的測量工具和可能的次類型的概念化發展較成熟時，或許可以並用混合成員模型來進行、比較分類的適合度。

第三，民粹主義做為一種意識型態可能影響的範疇，或有本文未觸及的地方。本文嘗試性的探究也未發現民粹主義與中國因素相關，也就是高度民粹民眾並未特別支持中國移民或是鼓勵投資中國。<sup>10</sup> 其他研究者提出民粹主義和威權主義之間的「選擇性親近」，也值得加以釐清。

第四，當下民粹主義所牽涉的權力集結和政治動員過程，以及民粹主義者在地方政府的運作及後果，當然也是制度層面的分析研究者應盡快進行的研究課題，以便清楚地瞭解民粹主義對民主體制與自由價值的潛在威脅。

最後，在這一波資料當中，高度民粹民眾的確比較傾向於支持國民黨。在選舉競爭中的贏家或輸家的定位，很有可能是有力的解釋變數。另外，臺灣學界過去並沒有設計相同，甚至是類似的題目進行調查可供進行比較分析。目前本文很難僅就一波資料，就斷定臺灣的民粹主義者是否高度集中在單一政黨。贏家或輸家，及其牽動的相對政治效能感起伏，是與政黨輪替高度相關的動態。這些政治波動對於民粹主義的衝擊，需要更多研究資料來支持相關的論點。如果能夠在國民黨執政，或同一政黨不同領導人執政期間，對民粹主義進行跨執政黨的比較觀察，這樣的研究設計，不僅深化民粹傾向的研究、在理論上提出與歐美脈絡不同的民粹主義解釋模型，也深具重大的在地性意義。

---

10 未列於文內。

## 作者簡介

### 蔡明璋

第一作者，目前為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兼副主任，臺灣東南亞學會理事長。曾任臺灣社會學會理事長，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Quality-of-Life Studies 會長，國際社會學會 RC55-Social Indicators 主席。研究興趣為東亞社會的家庭、工作、福祉等議題。論文發表在 *China Quarterly*, *Comparative Sociology*, *Globalizatio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and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 等國際期刊，最近出版 *Global Exposure in East Asia*，主編 *Family, Work, and Wellbeing in Asia* 與 *Quality of Life in Japan: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Happiness* 兩本書。

### 潘欣欣

通訊作者，目前為東吳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研究興趣為政治社會學、社會心理學、調查研究方法、當代中國政治轉型的社會基礎。論文發表在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Democratization* 等國際期刊。

## 附錄1：民粹主義原始問題與測量尺度

層面	原始問題	測量尺度
人民決策		
人民決策	有人說：「應該是人民，不是政府官員，來決定最重要的政策。」	(1) 非常同意 (2) 同意 (3) 不同意 (4) 非常不同意
反菁英情緒		
沒影響	有人說：「我們一般民眾對政府的作為，沒有任何影響力。」	(1) 非常同意 (2) 同意 (3) 不同意 (4) 非常不同意
不理會	有人說：「政府官員上任後，很快就不理會一般民眾的感受。」	
不在乎	有人說：「大多數政治人物不會在乎我們一般民眾的想法。」	
不允許	臺灣的政治體制，會允許您這樣的人，對政府所做的表示意見嗎？	(1) 一定會 (2) 很會 (3) 部分會 (4) 很少會 (5) 絕不會
庶民誠意		
善意	有人說：「為公共事務挺身而出的民眾，常常是出於善意的，但官員往往不支持。」	(1) 非常同意 (2) 同意 (3) 不同意 (4) 非常不同意
被糟蹋	有人說：「一般民眾常被有錢有勢的政治人物糟蹋。」	
強力領導		
強力領導	一個不會受到立法院與選舉所干擾，且強而有力的領導者	(1) 很好 (2) 好 (3) 壞 (4) 很壞

## 附錄2：社會經濟背景與相關的政治、社會容忍態的測量

	原始問題	測量尺度
家庭經濟狀況	請問您覺得自己家庭目前的經濟情況怎麼樣？	(0) 好 (1) 不好
家庭收支狀況	在過去一年中，請問您家的收支狀況如何？	(1) 有存到錢 (2) 收支平衡 (3) 花掉積蓄，可能還要借
階級認同	人們有時會把自己劃分到不同的階級中，請問您認為自己是屬於哪一個階級？	(1) 中上階級 (2) 中下階級 (3) 勞工階級
父親族群身分	請問您是臺灣閩南人（河洛人）、臺灣客家人、臺灣原住民，還是大陸各省市？	(1) 閩南人 (2) 客家人 (3) 原住民 (4) 外省人
政黨認同	如果明天有全國性大選，您會投票給哪個政黨？	(1) 民進黨 (2) 國民黨 (3) 泛藍 (4) 泛綠 (5) 無黨籍 (6) 其他
生活水準與努力	就您個人的情形來說，請問您認為您目前的生活水準和您的努力比起來公不公平？	(1) 很公平 (2) 公平 (3) 不公平
地區	受訪者居住地	(1) 北：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新竹市（縣）、宜蘭縣 (2) 中：苗栗縣、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 (3) 南：嘉義市（縣）、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澎湖縣 (4) 東：花蓮縣、臺東縣

## 續上頁附錄 2

貪腐知覺相關問題		
貪腐看法	現在我要請您告訴我，您對貪腐（臺：污錢）的看法。貪腐就是行賄、送禮，或是送紅包，這樣事情才辦得出來。您對臺灣貪腐的看法是什麼？1表示在臺灣無貪腐，10表示臺灣貪腐很多	1 在臺灣無貪腐 10 臺灣貪腐很多
涉入貪腐的程度	下面的人或組織，您認為他們涉入貪腐的程度如何？是都沒有、有一些、大部分有，或是都有？(1)中央機關，(2)企業執行長，(3)地方機關，(4)公共服務提供者	1 都沒有 2 有一些 3 大部分有 4 都有
政治信任	下面所列舉的團體組織中，請說出您對他們的信心程度，是非常有信心、有點信心、不太有信心，還是非常沒信心？(1)中央政府，(2)政黨，(3)國會，(4)公家機關，(5)選舉	1 非常有信心 2 有點信心 3 不太有信心 4 非常沒信心
對受污名人口的態度		
同性戀	在以下各種人當中，請問您	0 願意
愛滋病患	不願意跟誰作鄰居？	1 不願意
移民／外籍移工		

## 參考書目

王振寰、錢永祥，1995，〈邁向新國家？民粹威權主義的形成與民主問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0: 17-55。DOI: 10.29816/TARQSS.199508.0002

(Wang, Jenn-Hwan and Sechin Y.-S. Chien, 1995, Maisiang Sin Guojia? Mintsuei Weichyuan Jhuyi De Singcheng Yu Minjhu Wunti [March towards a New Nation State? The Rise of Populist Authoritarianism in Taiwa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Democracy]. Taiwan Shehwei Yanjiou Jikan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20: 17-55.)

林文正、林宗弘，2019，〈韓流與柯粉：台灣民粹政治的社會起源〉。論文發表於「社會意向暨臺港社會發展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9年5月30日至31日。

(Lin, Wen-Jeng and Thung-Hong Lin, 2019, Hanliou Yu Kefen: Taiwan Mintsuei Jhengjih De Shehwei Chiyuan. Paper presented at Shehwei Yisiang Ji Tai Gang Shehwei Fajhan Yantaohuei, Taipei: Jhongyangyanjiouyuan Shehweisyueh Yanjiuouso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May 30-31 2019.)

李宗榮、林宗弘編，2017，《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Lee, Zong-Rong and Thung-Hong Lin eds., 2017, Weijing De Chiji: Jhuansing Jhong De Taiwan Jingji Yu Shehwei [Unfinished Miracle: Taiwan's Economy and Society in Transition]. Taipei: Jhongyangyanjiouyuan Shehweisyueh Yanjiuouso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張佑宗，2009，〈搜尋台灣民粹式民主的群眾基礎〉。《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5: 85-113。DOI: 10.29816/TARQSS.200909.0003

(Chang Yu-Tzung, 2009, Sousyun Taiwan Mintsuei Shih Minjhu De Chyunjhong Jichu [The Mass Bases of Populist Democracy in Taiwan]. Taiwan Shehwei Yanjiou Jikan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75: 85-133.)

黃昱琄，2014，〈台灣民粹主義轉變的探討：選舉民粹主義的形成〉。

《弘光人文社會學報》17: 52-73。

(Huang Yu-Ting, 2014, Taiwan Mintsueijhuyi Jhuanbian De Tantaoyuanjyu Mintsueijhuyi De Singcheng [A Study of the Transition of Taiwan's Populism: The Formation of Populist Electoralism]. Hongguang Renwun Shehueisyueh Bao [Studies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17: 52-73.)

黃昱琄、蔡瑞明，2015，〈晚近臺灣民粹主義的發展：「人民」與「他者」想像的形成〉。《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53(3): 127-163。

(Huang Yu-Ting and Ruey-Ming Tsay, 2015, Wanjin Taiwan Mintsueijhuyi De Fajhan: "Renmin" Yu "Ta Jhe" Siangsiang De Singcheng [Populism in Contemporary Taiwan: Forming Images of 'The People' Against 'Others']. Sih Yu Yan: Renwun Yu Shehueikesyueh Chikan [Thought and Words: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53(3): 127-163.)

陳志柔、吳家裕，2017，〈臺灣民眾對外籍配偶移民的態度：十年間的變化趨勢（2004-2014）〉。《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9(3): 415-452。

(Chen Chih-Jou Jay and Jia-Yu Wu, 2017, Taiwan Minjhong Duei Waiji Pei'ou Yimin De Taidu: Shihnian Jian De Bianhua Chyushih, 2004-2014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Marriage Migrants in Taiwan: The Ten-Year Change, 2004-2014]. Renwun Ji Shehueikesyueh Ji K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29(3): 415-452.)

Airoldi, Edoardo M., David Blei, Elena A. Erosheva, and Stephen E. Fienberg, 2014, "Introduction to Mixed Membership Models and Methods." Pp. 37-48 in *Handbook of Mixed Membership Model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edited by Edoardo M. Airoldi, David Blei, Elena A. Erosheva, and Stephen E. Fienberg. Boca Raton, FL: Chapman and Hall/CRC Press. DOI: 10.1201/b17520-8

Akkerman, Agnes, Cas Mudde, and Andrej Zaslove, 2014, "How Populist Are the People? Measuring Populist Attitudes in Voter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7(9): 1324-1353. DOI:

10.1177/0010414013512600

- Anselmi, Manuel, 2017, *Populism: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 Campos, Luciano and Agustín Casas, 2020, "Populism and Income Redistribution." *Economics Letters* 186: 108773. DOI: 10.1016/j.econlet.2019.108773
- Canovan, Margaret, 1999, "Trust the People! Populism and the Two Faces of Democracy." *Political Studies* 47(1): 2-16. DOI: 10.1111/1467-9248.00184
- Cardoso, Eliana and Ann Helwege, 2017, "Populism, Profligacy, and Redistribution." Pp. 45-74 in *The Macroeconomics of 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 edited by Rudiger Dornbusch and Sebastian Edward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heng, Yen-hsin Alice, Fen-Chieh Felice Wu, and Amy Adamczyk, 2016,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 Homosexuality in Taiwan, 1995-2012."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48(4): 317-345. DOI: 10.1080/21620555.2016.1199257
- Chu, Yu-Wei Luke and Ming-Jen Lin, 2016,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tergenerational Earnings Mobility: Evidence from Taiwan."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2835881. DOI: 10.2139/ssrn.2835881
- Clark, Shaunna L. and Bengt Muthén, 2009, *Relating Latent Class Analysis Results to Variables Not Included in the Analysis*.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Cramer, Katherine, 2016, "Listening to Rural Populist Support for Right-Leaning Candid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omparative Politics Newsletter* 26(2): 89.
- de la Torre, Carlos and Enrique Peruzzotti, 2018, "Populism in Power: Between Inclusion and Autocracy." *Populism* 1(1): 38-58. DOI: 10.1163/25888072-01011002
- Finch, W. Holmes, 2021, "Performance of the Grade of Membership Model Under a Variety of Sample Sizes, Group Size Ratios, and Differential Group Response Probabilities for Dichotomous Indicators."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81(3): 523-548. DOI: 10.1177/0013164420957384

- Hellmann, Olli, 2017, "Populism in East Asia." Pp. 161-178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pulism*, edited by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Paul A. Taggart, Paulina Ochoa Espejo, and Pierre Ostigu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erman, Lise Esther and James Muldoon, 2018, "Popu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From the Fringe to the Mainstream." Pp. 1-20 in *Trumping the Mainstream: The Conquest of Democratic Politics by the Populist Radical Right*, edited by Lise Esther Herman and James Muldoon. Abingdon, UK: Routledge.
- Hochschild, Arlie Russell, 2016, "The Ecstatic Edge of Politics: Sociology and Donald Trump." *Contemporary Sociology* 45(6): 683-689. DOI: 10.1177/0094306116671947
- Hochschild, Arlie Russell, 2018, *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Anger and Mourning on the American Right*. New York: The New Press.
- Hsiao, Yi-ching, Su-feng Cheng, and Christopher H. Achen, 2017, "Political Left and Right in Taiwan." Pp. 198-222 in *The Taiwan Voter*, edited by Christopher Achen and Te-Yu Wang.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Kaltwasser, Cristóbal Rovira, Paul A. Taggart, Paulina Ochoa Espejo, and Pierre Ostiguy, eds, 2017,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pu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rx, Paul, 2020, "Anti-Elite Politics and Emotional Reactions to Socio-Economic Problems: Experimental Evidence on 'Pocketbook Anger' from France,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71(4): 608-624. DOI: 10.1111/1468-4446.12750
- Marx, Paul and Christoph Nguyen, 2018, "Anti-Elite Parties and Political Inequality: How Challenges to the Political Mainstream Reduce Income Gaps in Internal Efficac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57(4): 919-940. DOI: 10.1111/1475-6765.12258
- Mudde, Cas, 2004, "The Populist Zeitgeist."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39(4): 541-563. DOI: 10.1111/j.1477-7053.2004.00135.x
- Nylund-Gibson, Karen and Andrew Young Choi, 2018, "Ten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about Latent Class Analysis." *Translational Issues in*

- Psychological Science* 4(4): 440-461. DOI: 10.1037/tps0000176
- Oberski, Daniel, 2016, "Mixture Models: Latent Profile and Latent Class Analysis." Pp. 275-287 in *Modern Statistical Methods for HCI*, edited by Judy Robertson and Maurits Kaptein.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DOI: 10.1007/978-3-319-26633-6\_12
- Pappas, Takis S., 2019, *Populism and Liberal Democracy: A Comparative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ooduijn, Matthijs, and Teun Pauwels, 2011, "Measuring Populism: Comparing Two Methods of Content Analysis." *West European Politics* 34(6): 1272-1283. DOI: 10.1080/01402382.2011.616665
- Roxborough, Ian, 1980, *Theories of Underdevelopment*. London, UK: Macmillan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 Sawer, Marian, and David Laycock, 2009, "Down with Elites and Up with Inequality: Market Populism in Australia and Canada." *Commonwealth & Comparative Politics* 47(2): 133-150. DOI: 10.1080/14662040902842836
- Schulz, Anne, Philipp Müller, Christian Schemer, Dominique Stefanie Wirz, Martin Wettstein, and Werner Wirth, 2018, "Measuring Populist Attitudes on Three Dimens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30(2): 316-326. DOI: 10.1093/ijpor/edw037
- Stanley, Ben, 2008, "The Thin Ideology of Populism."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13(1): 95-110. DOI: 10.1080/13569310701822289
- Svolik, Milan W., 2013, "Learning to Love Democracy: Electoral Accountability and the Success of Democrac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7(3): 685-702. DOI: 10.1111/ajps.12005
- Taggart, Paul, 2000, *Populism*. New York: Open University Press.